

杨勋著

良知的
命运

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追忆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一份知识女性坎坷命运的真情实录

心
境



杨勋
著

心路：
良知的命运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路：良知的命运/杨勋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

ISBN 7-5011-6601-3

I . 心… II . 杨… III . 杨勋—回忆录 IV .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117 号

心路：良知的命运

杨勋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 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601-3/I·410 定价：24.00 元

谨以本书献给我可敬的父母，留给
我可爱的儿孙，感谢他们给予和延续我
的生命。

序 言

赵履宽

杨勋曾打算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为她的这本书作序，但考虑到这本书中涉及到不少熟人和名人，这可能给作序者带来某些不便，因此，请人作序一事就作罢了。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当一个人决定做某一件重大的事情时，往往会公开说：“我有资格做这件事”，以强化自己的决定。想到此，我猛然决定要“与国际接轨”，自告奋勇为这本书写序言。尽管我自认为有资格做这件事，但是杨勋是否接纳这种国人并不习惯的做法呢？所幸的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自荐。

为别人的书作序，主要的任务是评介这本书及其作者。我和杨勋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2003年8月6日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更重要的，我们两人有着大体相同的善恶标准和政治倾向。看来，我不仅有资格，也应当为她的这本书作序。不仅如此，她的这本书还使我放弃了出版我本人自传的机遇。我的一位早年毕业的在学术和事业方面都颇为成功的研究生多次恳切表示，愿资助我出版一本自传，其中将附录我的代表性学术论著。正当我开始为写自传做准备之时，杨勋把这本书的目录、后记及部分手稿交给我。仔细阅读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写自传的计划。为什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杨勋崎岖不

平、惊险不断、悲喜交加、富有戏剧性的一生相比，我的经历就显得平淡无奇了。既然如此，何必刻意去做浪费自己和读者时间的事情呢？

公开出版传记，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代写的，长期以来，似乎只是“大人物”的专利。在我国极左权势横行时期，不仅经济生活被政治权力控制，而且文化生活也被政治权力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像杨勋这样一个既非身居高位、又无显赫身世的教育科研工作者，是与传记无缘的。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使杨勋产生了写自传的念头。她说：“写自传，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尽责任，也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份精神遗产，至于是否能公开出版，无所谓。”我对她说：“既然费那么大的力气写出来，就应当公之于众。这不仅可以使别人分享你的奋斗成果，而且可以使儿孙们更珍视这份精神遗产。”她接受了我的观点。

杨勋是个什么样的人？公开出版她的这本书会产生何种社会效果？这要等待读者的检验。

杨勋是抗日烈士的女儿，13岁参加革命，曾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堪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心层次的依靠力量。但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在新政权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噩运不断，1957年被批判，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

八十高龄的李振声老友曾对杨勋说：“持续几十年的极左风浪，使许多知识分子扭曲了自己的个性，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你这个人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历经百难，初衷不改，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性格。这是很不容易的。”

基于半个世纪的近距离观察，我确认，杨勋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对真善美的一贯向往；第二，对知识和新鲜事物的执着追求。可以想象，如果杨勋生活在一个

正常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这两点一定会给她带来快乐和成就。而在极左权势盛行的环境中，这两点带给她的只能是不断的烦恼和灾难。

的确，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期这段期间，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从事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出现了“集体沉默”的现象，标新立异的创造欲望和能力退化了，忧国忧民的激情被压抑了。后果是，在不算短的 30 年间，代表良心和智慧的思想家几乎断代了。

三百多年前，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上个世纪 40 年代，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评价古今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了培根的结论，指出，知识只有与自由的社会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力量。哈耶克的新结论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最有知识的群体——知识分子，成了最没有力量的“臭老九”。显然，在制度理顺之前，制度创新比科技创新显得更为紧迫，更应受到重视。

生命的长短，对每一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所幸的是，杨勋在古稀之年能将自己的这本书奉献给社会。这对杨勋本人和她的亲友是一种难得的慰藉。此时此刻，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怀念那些被这段历史摧残并带着满腔悲愤离开人世的人们。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在微小的程度上告慰这些不幸者的在天之灵。

200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第一章	逃离敌占区	(1)
第二章	大喜大悲的 1945	(18)
第三章	黄河岸边宣誓入党	(36)
第四章	随军南下到杭州	(45)
第五章	人民大学五年	(55)
第六章	北京大学第一年	(79)
第七章	沉重的 1957	(86)
第八章	下放斋堂收获的不仅仅是汗水	(101)
第九章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15)
第十章	北大“四清”试点	(137)
第十一章	“文革”初期的遭遇	(148)
第十二章	关进半步桥和功德林监狱	(159)
第十三章	鲤鱼洲的泥巴让人窒息	(185)
第十四章	“死老虎”当会计	(206)
第十五章	1978 年的翻身户	(216)
第十六章	难产的《马寅初传》	(220)
第十七章	自告奋勇分管 77 级学生	(227)
第十八章	为农村改革出力	(233)
第十九章	支持“农村发展组”	(239)
第二十章	让世界了解中国农村改革	(253)

第二十一章	华沙和莫斯科之行	(262)
第二十二章	潜心编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269)
第二十三章	创办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	(279)
第二十四章	美国东部一百天	(286)
第二十五章	丹麦见闻	(292)
第二十六章	洛杉矶陪读	(300)
第二十七章	结识相马达雄律师	(315)
第二十八章	回 归	(320)
第二十九章	期 待	(331)
后 记			(337)



第一章 逃离敌占区

深沉的天空，由黑色转为灰色，一幅银灰色的帷幕，正在徐徐地拉开。

1944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早上，天刚亮，一辆独轮手推车咯吱咯吱地行进在中国北方光秃平原的乡间土路上。车子一边坐着一个中年农村妇女，另一边是她的女儿。推车的是一位农民。另一位护送她们的青年农民在车子后面步行。他们几个人心中各有心事，但是谁都不说话，大家都明白此行的危险和艰难，气氛紧张，前途未卜，不知这一路是凶还是吉。不管怎样，我和母亲逃出敌占区投奔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终于要实现了。当时我母亲34岁，按现在的标准还是青年，不到中年；我13岁，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护送我们的农民是我的大舅——王洪印。他是我四姥爷的大儿子，那时还不到30岁。大舅的小名叫“不像样”。大舅还有个弟弟叫“不听说”，大号叫王洪甲。据老人们说，起这样的怪名字是为图吉利，可以保男孩子长命百岁。我母亲是独生女，我没有亲舅舅。我自小只知道不像样大舅和不听说二舅。姥姥亲切地叫他们的小名，从不叫他们的大号。在中国农村，谁家没有男孩，侄儿就是当然的继承人。侄儿们承担着对叔叔婶婶的全部赡养责任。我的老爷排行第五，大舅叫我姥姥“五婶子”，叫我母亲姐姐。此刻，我们母女要出远门逃生，不管怎样艰难危险，大舅也要全力以赴。

我们的行动计划和逃离路线，是一年前父亲为我们拟定的。按父亲的计划，我们从我姥姥家的村子——山东省寿光县侯镇王家辛章出发到胶济铁路的潍县火车站，坐火车向东行两站，在高密站下车，过铁道往南乘汽车去诸城，然后赴莒县，再转去莒南，那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了。父亲信上说，到莒南某地的一个中药店，就可以找到他了。

从寿光到莒县只有几百里路程，现在普通的小汽车中速行驶，大概半天就可到达，但那时却像漂洋过海去外国一样艰难。当时山东省城镇，已被日军占领，农村活动着国民党杂牌军和八路军游击队。我姥姥家是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领导人是马保三、赵寄舟。我父亲家的村子南仉庄，距我姥姥家只有六里路，却是国民党十五旅张景月的地盘。我们要到铁路以南八路军的根据地，必须先到侯镇日本人管的警察局办良民证。这件事，还决不能走漏风声给国民党特务。除了这些超级政治障碍外，我们自己从封闭的村庄出远门进城市也很难。我母亲是小脚，除了从娘家到婆家这6里路距离，从未到过外地。母亲不识字，她的名字叫王秀华，还是结婚后我父亲给她取的。她不认得自己的名字，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当时虚岁十三岁，虽然上了一年高小识字不少，但由于亲眼见亲耳听到日本鬼子、国民党残害屠杀百姓的暴行，看见国民党十五旅在我们南仉村搜捕活埋共产党嫌疑分子，国民党特务经常从学校里抓进步学生，特别是在1943年夏天我父亲秘密回家看望我们之后，我对于外面的世界更害怕了。这次跟母亲南行，心中又喜又怕，十分不安。

我呆坐在独轮车上，两眼无神，脑子里满是敌占区的可怕记忆。现在居然要过铁路离开这虎口，我们能成功吗？我盼望成功，害怕失败，不知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虽然知道跟着母亲去找父亲是件好事，但心中充满恐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有听天由命的神情。

独轮车的速度跟步行差不多，60里土路几乎走了一天。傍晚，我们到了潍县城，到达车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在潍县的马路上，我第一次见到电灯，很是惊奇。我们紧跟着大舅。王家辛章村里只有大舅出过远门，下关东见过火车。他上学不多，但识字不少。我们深信大舅能保护我们，能带我们到达目的地。黑夜里，我们举着自己的良民证和车票上了火车。车厢里座位上坐着日本兵，他们戴着黑色口罩（当地老百姓说他们戴着“笼咀”），吃着军用饭盒里的白米饭和生鱼片。我们这些中国人都挤站在车厢走道上。我第一次坐火车，又是紧张，又是劳累，快到高密站下车时呕吐了一地。

第二天早上，到达高密。我们提着包袱，跟着大舅走到汽车站，挤上了开往诸城的汽车。上汽车的人特别多，拥挤不堪，十分混乱。人们强行登车，维持秩序的人举着皮带胡乱抽打着拥挤的人群。挨打的人们好像一点也不在意，只要挤上那敞篷汽车，似乎什么都能忍受。

一路上，我们三个惟恐走散。我一步不离地紧跟着大舅，紧拉着母亲。母亲小脚走不快，我们上车下车转车都非常紧张。从诸城开往莒县的汽车，比高密到诸城的好不了多少，只是维持秩序的人不那么凶狠，不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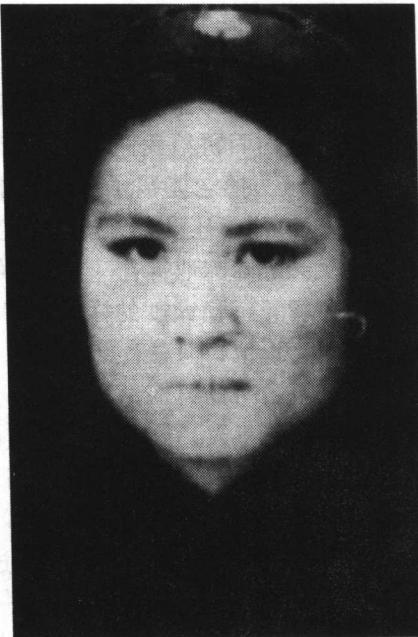
经过紧张混乱的辛苦奔波，我们一行三人终于在离家后的第二天下午胜利地到达了莒县。在莒县下车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站在一辆大型手推车旁接到了我们。那人说他是药店的伙计，是掌柜的派他来接我们的。也不知他跟大舅用什么暗号接上头。只见那人特别热情地请我和母亲上了他的车子，由他推着。大舅依然跟在一旁步行。在路上，那人一边推车一边询问我们沿途的经历。我虽然不用回答他的问题，但整个气氛已经全变了，紧张恐慌的情绪顿时一扫而光。我们被成功和胜利激动起来，脸上挂满了笑容。这时，我坐在车上不再愁眉苦脸，心中充满喜

悦。只见那早春明媚的蓝蓝的天空特别地晴朗，路边的小草已经吐出幼芽，心情特别舒畅轻松，真像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新世界。后来，我们学会唱一首当年流行的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到根据地的欢快感受在那首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每每唱起那支歌，我总是激动不已，很容易地回忆起从莒县往南走的那天路上的情景。

我们去的“中药店”属于莒南地界，那是八路军山东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的一个联络点。我们在“中药店”吃了很丰盛的晚饭。饭后，我父亲的警卫员张修身就来接我们了。

张修身还是两年前跟我父亲回寿光时那样快活。我一见就认出了他。母亲叫他小张，我叫他小张叔。当时他20岁了，比我大7岁。晚上，我们到了父亲住的村子，在一家农民的宅院里见到了父亲。母亲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掉眼泪。我默默地站在一旁，低着头，不敢直看这个陌生的大个子中年男人，心中十分紧张，因为我从小在家就没见过男人，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姥姥三人。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爹，我心里也深信不疑，我见过他的相片，但是我怎么也叫不出来，只是点点头，表示默认。他们也不逼我叫爹。

两天的奔波劳累和惊吓，我很累，倒在父亲的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大舅和小张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也各自去别处休息了。半夜，我模糊地听到父亲和母亲说话，母亲总是埋怨丈夫多年不顾家，东奔西跑，不顾死活，父亲总是谅解地微笑着，表示歉意。父亲是一个很和气很令人敬佩的人。他对母亲很好，很有丈夫气度。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文化，也不娇气，但她是独生女，不知道照顾丈夫。她比父亲小6岁，很依赖父亲。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算是相亲相爱的。如果在和平年代，我们一家也会是幸福的。这种印象，还是两年前与父亲在海边的那次秘密会见留给我的。



1944年，逃离敌占区前
的母亲。

那是1943年夏天，父亲带小张回到渤海边一个叫央子的村庄。我们在那里跟父亲一起住了一个星期，得知他1942年“大扫荡”后，决定转回山东的动因。

1942年，父亲在河北省遇上了有名的冀中“大扫荡”，受了重伤。当时，他和小张骑在马上，他的马被日本鬼子击中打死，他的腿被打伤，他和小张也走散了。“大扫荡”过后，父亲和小张在死人堆中相互找了好几天，最后才找到。养伤期间，父亲特别思念分别8年的妻子和女儿，于是，决定伤愈后转到山东军区工作，顺便安置家属与家人团圆。那时，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驻在鲁南一带，从冀中到鲁南转移途中，他通过地下工作渠道的安排，悄悄地在寿光海边的央子村与我们秘密会见。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天，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央子，我见到父亲的腿上裹着绷带，身上穿着一身黑色便装，走路腰微弯，

腿不直，还有很重的胃病。当时他虽然只有三十七八岁，却像一个老者的样子。父亲住在一个农民家的一间磨房里，热情地接待我和母亲，还有我姥姥。他叫小张去买当地的鳎目鱼，做白面饼给我们吃。姥姥不停地埋怨他一去若干年杳无音讯，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让她们受了多少苦。眼下都快 40 岁了还没有男孩，一定要他带着老婆孩子成个人家。父亲笑眯眯地听着，表示理解和歉意。他神情自若，一副善良智慧沉稳大度的样子，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我虽然从心里亲近他，但总有点怕他。

父亲原名叫杨树梅，字魁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杨绍震。父亲兄弟三人，数他最小，被称为老三。他的两个哥哥早年在东北经商，他却酷爱读书，后来又考进了奉天的讲武堂军官学校。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奉天回家教书，一年后去北平做事，每年回家过年还能带回些大洋来。1932 年我出生。我 3 岁那年他又去了北平，此后 9 年一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在南仇庄，大伯二伯都有一院房子，我家只有一个空园子，没有房子。我母亲一直住在二伯家的东房里。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常年住在王家辛章姥姥家。姥姥比母亲只大 16 岁，当时 50 岁左右，很能干。我们靠着姥姥过日子。姥姥的娘家在北乡的地沟村，家境贫穷，15 岁就嫁给比她大 10 岁的我老爷。我老爷对她很好。他们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我母亲和两个舅舅。在母亲十几岁时，一场瘟疫夺去了姥爷和两个亲舅舅的生命。姥姥从此守着独女孤苦伶仃过日子。母亲长大后被我的祖母相中，嫁到南仇庄杨宅上做了读书人家的媳妇。我父亲对姥姥非常孝敬。他在家教书那一年，常接姥姥来住，还把亲手种的瓜果摘下先供姥姥品尝。姥姥对这位知书达理的女婿极为器重。父亲多年出门在外，姥姥不辞劳苦，精心为他护养妻子女儿，从无怨言。但是一去九年无音讯，生死不明，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怎么能让一个农家妇女承受

得了。在央子村，姥姥要求父亲带走母亲，并不是为自己解除负担，她希望他们能尽快有个男孩，不至于像她这样成了“绝户”。父亲细心地倾听着姥姥的怨言和请求，最后决定他先去鲁南滨海抗日根据地，随后就安排来接我和母亲。

1943年央子村会见以后，我在北饥学校的处境突然变得十分恶劣。校长何子明几次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点我的名，质问我父亲回家的情况，逼问我父亲回来带了多少人和多少支枪。我一声也不回答，只说不知道。我母亲嘱咐过：“谁问你爹回家的事，一个字也不能说，说了揪下你的脑袋。”校长何子明为了让我说出父亲回来的情况，还说他是我父亲的老同学，说当年父亲去关东是他帮忙办的护照等等，引诱我交待父亲的情况。我脑中只记住母亲的话，一问三不知，一个字也不吐露。由于父亲那次秘密回乡，国民党特务经常到南饥庄我家里来威胁恐吓。母亲和姥姥商量，我们不能再住在家里了，决定尽快逃离虎口，冒再大的危险也要离开家乡去找父亲。

在父亲的小屋里，我睡得很香很熟，几乎一觉睡到大天亮。梦中还见到了老家人传说的不少关于父亲的故事，美美地感受到了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但早上醒来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地铺的干草上，可能是父母上床前把我抱下来的。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堵在心口，但很快就消散了。我自小从未离开过母亲单独睡觉，何况是被放在地铺上。我知道这准是父亲的主意，母亲是不会这样对待我的。父亲的样子很威严，也和蔼可亲，我心中害怕他，但更敬爱他。在父亲面前，我不敢任性，不管心里怎么不悦，脸上还是驯服的样子。

跟父亲一起住的那几天，我们在住处单独吃饭，不去伙房。有一天吃早饭时，我面前没有筷子，我叫小张给我拿一双筷子来。父亲看我一眼，轻声但严厉地说：“自己拿去，小张也不是伺候你的，你是娇小姐啊！”我受不了他的

那种训斥，离开饭桌不吃饭了，趴在床上大哭起来。父亲对母亲说：“都是你们把她惯坏了，这么大的小姐脾气。”他不理我，也不管我吃不吃饭，任我哭，只有母亲劝我快吃饭。自那以后，我乖多了，他说什么我都认真地听着，不敢再耍脾气，使性子。父亲见我晚上睡觉光着身子，有一天下午开会后，给我缝制了一条短裤，叫我晚上一定穿上短裤。晚上他开会回来，见我已躺在地铺上，就问我是否穿了短裤。我一边回答“穿了”，一边赶快掀开被子让他看。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要听话学好。这么大的闺女了，哪能光着身子睡觉！”父亲生活上很细心，给我找来了牙刷牙粉，教我刷牙，还把我的一条长辫子分成两条扎。此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愿意听他的，心中十分敬佩他，信服他。他见我听他的话很是得意，对母亲说：“婆娘们管不好孩子。”

有一天，我们住的房子里来了一群人，说是驻在当地的领导干部们来看我们。在拥挤的小屋子里，父亲向母亲一一作介绍。他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和那些人对他的敬重，使他显得既亲切又威严。我对于村里住的这些人也感到神秘、可敬。在敌占区时，国民党天天宣传八路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六亲不认，无恶不作。我们学校的画报上称共产党八路军是“共匪”、“毛匪”，用铁钩子钩住毛泽东和朱德的头，非常可怕。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些共产党八路军头头却这样文静高雅，可敬可亲。我呆了，心越来越虚了，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我不再怕他，不把他当成陌生人了，对他八九年不管我们，也不再埋怨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父亲不仅是一个正经读书人，大好人，而且是一个甘愿吃大苦立志做大事的人。他是为抗日救国才抛家舍业不顾生死奔赴抗日前线的。他是个可敬可亲的人，完美高尚的人。关于父亲的故事，家乡人广为流传，我虽然似懂非懂，也略有所知，现